

加拿大二线城市华人新移民经济融合研究 ——“三重玻璃效应”与移民向下层社会流动^{*}

郭世宝¹ 著，万晓宏² 译

(1.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教育学院，阿尔伯塔 卡尔加里 T2N1N4;

2.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关键词] 加拿大；华人研究；移民研究；新移民；经济融合；三重玻璃效应；二线城市

[摘 要] 论文对加拿大二线城市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华人新移民的主要特点、移民动机和融合过程中的主要障碍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新移民在加拿大向下层社会流动的问题。研究显示，新移民在经济融合过程中遭遇多方面的障碍，尤其在就业和语言方面。他们在移民加拿大之后，经历了去技能化和以前的学历和工作经验贬值，促使他们向下层社会流动，而这种状况反过来又阻碍了他们的融合进程。华人新移民的负面经历可以归因于由玻璃大门、玻璃房门和玻璃天花板构成的“三重玻璃效应”。加拿大政府应采纳融合框架政策，除承认移民的流动自由外，还要保证他们能享有与其他加拿大人一样同等的公民权益。

[中图分类号] D634.3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 (2014) 04-0010-14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Recent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s Second-Tier Cities: The Triple Glass Effect and Immigrants'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GUO Shi-bao¹ (author), WAN Xiao-hong² (translator)

(1.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lgary T2N1N4, Canada;

2.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SCNU, Guangzhou 510631, China)

Key words: recent Chinese immigrants; economic integration; triple glass effect;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second-tier cities in Canada

Abstract: The recent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lgary and Edmonton have encountered multi-faceted barriers, particularly in employment and language during their economic integration. Furthermore, they have experienced deskilling and devaluation of their prior learning and work experience after immigrating to Canada. As a consequence, many have suffered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poor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which have adversely hindered their integration process. Immigrants' negative experience can be attributed

[收稿日期] 2014-04-22; [修回日期] 2014-09-26

[作者简介] 郭世宝 (1965—)，男，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及博士后导师，加拿大民族研究会会长，《加拿大民族研究》共同主编，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民族研究、加拿大中国移民、加拿大华侨社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

[译者简介] 万晓宏 (1969—)，男，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北美华人政治参与等。

^{*} 原文载于《加拿大民族研究》(Canadian Ethnic Studies) 第45卷，2013年第3期，第95~115页。

to a *triple glass effect* consisting of a *glass gate*, *glass door*, and *glass ceiling*. While a *glass gate* denies immigrants' entrance to guarded 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a *glass door* blocks immigrants' access to professional employment at high - wage firms. It is *the glass ceiling* which prevents immigrants from moving up to management positions because of their ethn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should adopt an inclusive framework that works toward recognitive justice in balancing freedom of mobility with recognition and full membership.

加拿大具有悠久的移民历史，移民将继续在该国的未来发展中扮演战略性角色。但是，现行的加拿大移民政策至少存在三个突出的问题。第一，加拿大的移民分布不均衡，大多数移民聚居在加拿大的大都会地区。2006 年加拿大人口统计显示，2001 年至 2006 年有 110 万移民迁入加拿大，几乎 70% 选择在多伦多、温哥华和蒙特利尔这三大城市定居。^[1]相比之下，这三大城市的人口仅占加拿大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新移民的高度集中给接纳他们的社区增加了压力，如难以提供充足的住房、就业、教育和社会服务，以帮助他们定居和适应。新移民的高度集中也造成了区域性的不均衡，导致加拿大出现了“新的对立现象”，把这个国家分割成多元文化的大都会地区和单一文化的其他区域。

由于移民分布不均衡，加拿大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其移民政策倾向于对大都市有利，而中小城市的情况一直被严重忽视。考虑到较小的都市地区的移民正在持续增加，如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这些二三线移民接纳城市，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加拿大移民政策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移民研究在过去这些年是怎样进行的。由于大多数移民定居在三大都会区，移民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二三线城市的移民经历一直被研究者严重忽视。^[2]这导致移民研究产生重大差距。由于移民定居和融合的过程本来就是地方性的，在全国层面得出的研究结论主要来自对加拿大大都会地区的研究发现，这样就低估了对具体城市的实际影响。^[3]因此，关注加拿大二三线城市的移民研究十分重要。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大陆新移民在加拿大二线城市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的经济融合，以缩小移民研究的巨大差距。本文首先评述全球化时代关于移民的文献，然后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发现，最后对结果进行讨论，并指出其政策含义。

一、移民全球化

当代跨国移民因全球化进程的刺激而加速。世界经济一体化需要人口的跨国界自由流动。^[4]如此看来，移民与其说是一种工作选择，不如说是对全球制度转型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反应和抵制。^[5]全球化和移民相互交织。移民是对全球化的反应，全球化使移民加速。卡斯尔斯 (Castles) 和米勒 (Miller) 用“移民全球化”这一术语来描述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时受到移民潮重要影响的趋势。^[6]因此，本文有必要首先探讨全球化现象，尤其是全球化与移民的关系。

全球化是个有争议的概念，它引发了长久的争论。^[7]因此，关于全球化没有一致的定义并不奇怪。关于界定全球化定义的尝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速度与时间、进程与流动、空间、正在加快的一体化及其相互联系。瑞泽 (Ritzer) 通过对这些方面的仔细考虑，把全球化定义为“一套正在加速的流动进程，由大量的世界空间和它们之间正在加快的一体化和相互联系所构成”。^[8]当代全球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发生了复杂信息技术的兴起与发展、来自日本的经济竞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石油危机。

贾维斯 (Jarvis) 用全球子结构和跨国公司使世界上层结构的权力集中化来描述全球化进程。全球子结构由经济体系和技术体系构成。世界上层结构包括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切，如国家和文

化。技术经济的核心是有实力在全球为其产品做广告，并形成巨大的市场。贾维斯认为，这种强大的核心受到美国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保护，并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实现霸权控制。通过这些政治、军事和机构的力量，全球子结构在国际、国内、地方和个人层面实现对世界上层结构的控制权。但是，贾维斯认为是技术提供了成功控制的方式。通过为消费品生产提供必要的知识，全球子结构控制了正在日益加快的自由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知识和资本。^[9]一些学者注意到，放松对市场的监管是以增加不平等为代价创造更多财富的方式。^[10]有证据显示，全球化使富人和穷人的差距日益扩大，环境问题不断恶化，公民参与和社区参与倒退，公民之间的不信任 and 疏远在增加。^[11]全球资本主义似乎已造成全球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12]

上述讨论主要是关于全球化如何在世界上层结构中推进。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自下而上的过程。^[13]移民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人们通过跨越国界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并向上层社会经济地位流动。目前大约有 2 亿人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国之外，约占世界人口的 3%。^[14]因为全球资源分配不均衡，移民倾向于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工业国家迁移。卡斯尔斯和米勒认为，当代移民有六大趋势，即移民全球化、移民加速化、移民差异化、移民女性化、移民政治化和移民分散化。^[15]综合考虑，这些趋势强调全球化背景下移民流动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之间的联系。

近年来，加拿大的移民趋势反映了卡斯尔斯和米勒总结的当代移民的六大趋势。加拿大一直受惠于移民的全球化、加速化、差异化和女性化。加拿大人口正在老龄化，移民在 2001—2006 年为加拿大提供了五分之一的劳动力。^[16]随着移民全球化的加剧，加拿大已加入国际竞争，争夺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先进技术和丰富人力资源的移民。尽管加拿大偏爱高技术移民，而且移民专业人士确实给加拿大带来了重要的人力资本，但是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在融入加拿大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时却遇到困难。移民加拿大之后，许多移民发现他们以前的学历和工作经历贬值或不被承认。大量研究显示，移民专业人士在他们的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流动中遭遇了“玻璃天花板”。^[17]

“玻璃天花板”这一比喻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是理解美国妇女在向企业管理层流动时遇到障碍的一种方式。^[18]之所以称为“玻璃天花板”，是因为一个人能通过它看到自己期待的管理岗位，但无法突破中间的障碍实现自己的理想。^[19]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该术语才扩大到在工作场所遭遇的种族歧视问题。王保华（Bernard Wong）的研究发现，少数族裔在加拿大遭遇的障碍经常体现为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准入条件，而不是“玻璃天花板”自身。^[20]但是，近年来，加拿大和其他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这一概念来分析移民的经历。^[21]

在有关卡尔加里的研究中，劳埃德·王（Lloyd Wong）和卡罗尔·王（Carol Wong）发现，在加拿大公司工作的华人工程师遭遇了“玻璃天花板”现象。他们的研究发现，因不同的种族、文化、肤色、语言、口音和宗教信仰，相当大比例的华人工程师感受并经历了“玻璃天花板”。他们在管理层和决策层的比例过低，管理级别越高，他们所占的比例越低。^[22]在美国，“玻璃天花板”也限制了许多硅谷华人晋升到管理层岗位，结果导致许多华人辞职并创办自己的公司。^[23]克利须那·潘德科（Krishna Pendakur）和拉维·潘德科（Ravi Pendakur）运用“玻璃天花板”这一概念分析加拿大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收入不平等。他们的系列研究发现，由于高薪工作岗位有限，年长的和受过更多教育的少数族裔男性与同样条件的白人男性相比，更容易遭遇“玻璃天花板”。^[24]

除了“玻璃天花板”这一概念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术语被用来描述移民遭遇的障碍，例如“玻璃地板”或者“粘胶地板”、“玻璃墙”和“玻璃房门”等。“玻璃地板”或“粘胶地板”经常被用来解释那些让移民从事低层次和低薪工作并阻止他们向高层职位流动的因素。^[25]莉莎·麦考埃（Liza McCoy）和克瑞提·马萨齐（Cristi Masuch）研究发现，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妇女在

不受专业限制的领域中找工作时遭遇到“玻璃墙”，即把她们阻止在外面的隐性障碍。^[26]此外，克利须那·潘德科和西蒙·伍德科克(Simon Woodcock)认为，“玻璃天花板”在很大程度上受“玻璃房门”的驱动。“玻璃房门”比喻限制弱势工人进入高薪公司工作的障碍。他们认为，就像“玻璃天花板”阻碍工资的合理分配一样，“玻璃房门”阻碍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在公司找到合适工作的机会。^[27]为了与他们的研究保持一致，本文通过聚焦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经历，参考他们移民前的社会地位，评估他们在经济融合过程中遭遇“玻璃天花板”的程度及相关因素，从而深入探讨移民向下层社会流动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文拟探讨以下几个问题：近年来有哪些中国人移民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他们移民到这里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是如何适应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加拿大社会的？他们在融合过程中是否遇到障碍？都是什么样的障碍？他们在哪些方面最需要帮助？为了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加拿大社会，他们对加拿大政府有何建议？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采取问卷调查法。在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采用同样的问卷。问卷调查法比人口统计资料分析能更深入地探讨上述问题，人口统计资料只能为评估移民的经历尤其是他们的经济表现，提供二手资料。问卷调查法也使本研究在较短时间内回收的问卷数量最大化。调查问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基本的人口分布信息；第二，移民加拿大的动机；第三，他们的融合经历，包括他们对加拿大及其就业情况的满意度；第四，总结评论。其中，第一部分试图扼要描述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出生地、现居地、公民身份、移民类别、婚姻状况、家庭成员和教育背景。第二部分的目的是探讨他们移民加拿大的原因，包括他们在加拿大居住的时间、移民的相关费用、移民加拿大的动机和是否已经实现他们当初为自己制定的移民目标。第三部分是问卷调查的核心，聚焦他们在加拿大的经济融合经历，并询问他们在哪些方面需要更多帮助。第四部分以开放式的问题结尾，邀请他们就更全面的改革进行评论，以帮助新移民更快地融入加拿大社会。

问卷由56个问题构成。这些问题为全面评估调查对象的移民经历提供原始数据。问卷使用英语和中文两种语言。调查对象是通过移民服务组织和华人移民更可能聚集的教会进行招募。加拿大登陆移民数据系统的纪录（现在称为永久居民数据系统），指导本调查有目的地挑选那些年龄在20岁~65岁、在中国大陆出生、经济上活跃的华人新移民作为调查对象。问卷调查分为两个阶段，总共回收255份完整的问卷。第一阶段从2004年10月至2005年6月，在爱德蒙顿收集了124份问卷；第二阶段从2005年10月至2007年6月，在卡尔加里收集了131份问卷。本研究运用SPSS分析所有数据。

选择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如上所述，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作为加拿大接纳移民的二线城市，需要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这两个城市接纳的移民数量正在持续增加。具体来看，过去10年来，繁荣的阿尔伯塔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一直在招募大量的移民专业人士，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帮助缓解该省的劳动力短缺。结果有近四分之一的卡尔加里居民（约22.2%）属于少数族裔，其中三分之二出生在加拿大之外，在全加排名第四。爱德蒙顿少数族裔占该市总人口的17.5%，在全加排名第五。选择爱德蒙顿和卡尔加里的第二个原因是华人在阿尔伯塔省是最大的少数族裔，占该省总人口的26.5%。2008年，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在全加接纳中国新移民的城市中排名第四和第五，仅次于多伦多、温哥华和蒙特利尔。^[28]由于关于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大多数研究聚焦于这三大城市，导致关于大草原城市华人新移民定居和融合经历的研究非常少。因此，本文聚焦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的华人新移民是及时的和具有战略眼光的。

三、研究结果

（一）华人新移民的特点

2006 年，根据包含所有移民个人信息的登陆移民数据，郭世宝和德沃兹（DeVoretz）系统分析了 1980—2001 年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主要特点。他们的研究显示，加拿大的华人新移民与他们的先辈有着本质区别。华人新移民不再是来自广东和福建乡村地区的同质性移民群体。相反，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和各行各业，其中近三分之一（30%）是独立移民。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以独立专业人士移民加拿大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数量庞大，其中 60.5% 接受过大学教育，这一规模前所未有。^[29]

本研究关于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特征总体上与郭世宝和德沃兹上述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似，但是也有一些差异。例如，255 份完整问卷的 51.4% 来自卡尔加里，其余的来自爱德蒙顿，占 48.6%，这反映了两个城市在过去一段时间接收华人新移民的差异。所有问卷中女性占 50.6%，比男性的 49.4% 稍多。这些调查对象的年龄比郭世宝和德沃兹上述研究对象的年龄小很多，其中 82% 处在 26~45 岁之间，属最佳工作年龄，平均年龄仅为 34 岁（参见图 1）。这恰好是加拿大移民项目针对的年龄群体。他们当中大多数是技术移民，占 68.3%，只有 18.3% 是家庭团聚移民。至于这两个城市的差异，卡尔加里吸纳的技术移民比爱德蒙顿更多，分别为 79.8% 和 56.1%。这些数据反映了近年来加拿大移民政策倾向于投资和技术移民，而不太欢迎家庭团聚移民和难民。^[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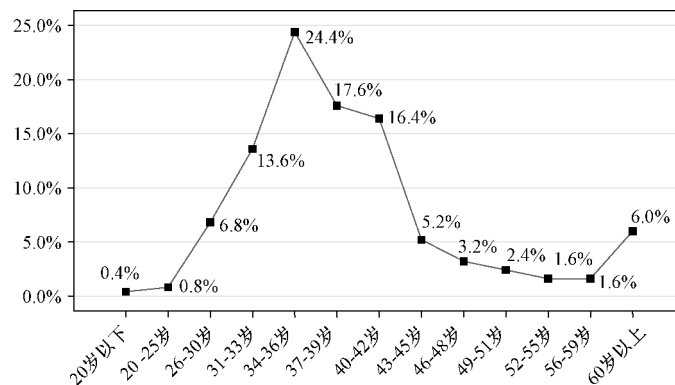


图 1 年龄分布

在教育背景方面，绝大多数调查对象移民加拿大时接受过中学以上教育，比例为 95.2%。具体来看，拥有学士学位的人数占 49.4%，拥有硕士学位的占 19.4%，拥有博士学位的占 13.4%，累计占样本总数的 82.2%（参见图 2）。卡尔加里吸纳了更多具有学士学位的移民（53.8%），爱德蒙顿吸纳了更多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移民（39.8%）。2008 年加拿大人口统计显示，在 2001—2006 年间移民加拿大的华人新移民当中，51% 具有大学学历，是加拿大出生人口的两倍多，在加拿大出生的人口中具有大学学历的仅有 20%。^[31]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新移民构成这一高学历群体，以致被称为“模范少数族裔”。该概念是个有争议的术语，通常用来描述受过高等教育、在职场上有所成就并成功融入北美文化的日裔和华裔。根据 2001 年人口统计数据，劳埃德·王和卡罗尔·王发现，尽管相当大比例的华人（34.8%）接受过大学教育，但没有支持模范少数族裔理论的证据。与 2001 年人口普查之前到达加拿大的早期移民相比，中国大陆新移民是个与众不同的群体，他们大都携带巨额人力资本移民加拿大。但关键问题是他们在加拿大能否充分发挥他们的教育和技术优势。^[32]模范少数族裔理论认为，华人新移民应该期待他们的

高等教育背景会给他们在职场上带来成功并向上层社会流动。如下所述，这种期待迄今为止太过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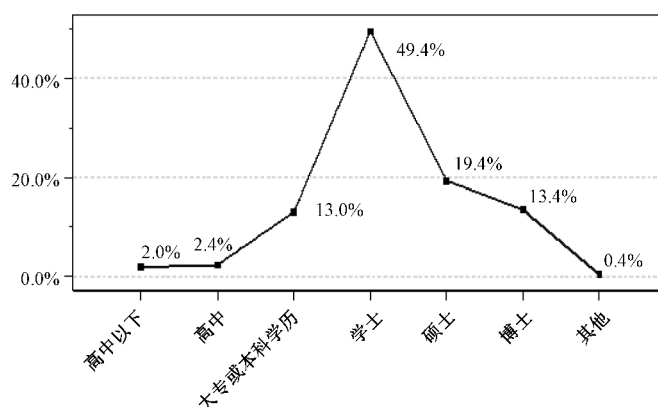


图2 教育背景

当问及他们在哪里接受最高层次教育时，超过四分之三（78%）的受访者表示在中国，仅有16.1%的受访者在加拿大获得他们的最高学历。超过一半（54.1%）的受访者称他们的英语语言能力达到中级或高级流利水平，该数字与2005年加拿大移民纵向调查的结果一致。^[33]至于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大约有一半受访者（49.8%）称他们移民加拿大不到三年；移居加拿大3-10年的更少，只占37.6%；10年以上的只有12.6%。总体来看，受访者在加拿大居住时间相对较短反映了他们的公民地位，只有30%的受访者具有加拿大公民身份。

（二）移民加拿大的动机

移民到一个新国家是个重大决定，需要仔细考虑和计划。以前的研究显示，中国人移民加拿大是为了寻找经济机会。^[34]但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加拿大优美的自然环境（52.5%）和博雅教育体系（47.5%）等非经济原因是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的最重要“推力”因素（参见图3）。在本研究中，较多提到的其他原因还包括寻找新的发展机会（25.1%）和获得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份（22.7%）。在这四个最强的动机中，有三个是非经济动机。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它与传统研究认为移民的主要动机是经济原因不同，并提出非经济因素的存在可能改变现实移民政策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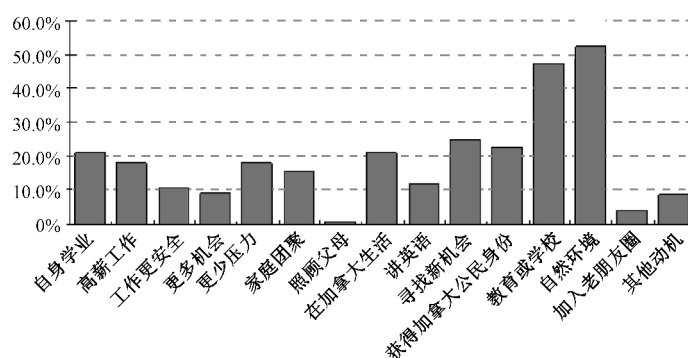


图3 移民加拿大的动机

本文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的华人新移民是否已经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调查发现，不到一半（43.5%）的受访者声称他们已经实现当初移民加拿大的主要目标。那些

没有实现当初目标的人当中，语言障碍（83.1%）和缺少加拿大工作经验（66.3%）是最经常提到的障碍；其次是他们在中国的工作经验不被承认（43.8%）、没有加拿大文凭（41.6%）和缺少社会关系网（39.3%）（参见图4）。2005年加拿大移民纵向调查结果也显示，语言障碍是出生在亚洲和中东地区移民的最严重障碍。语言障碍妨碍了移民找工作、获取社会和健康服务以及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和培训。该纵向调查结果也显示，缺少加拿大工作经验和外国文凭或工作经验不被承认是新移民面临的严峻问题。^[35]技术移民在加拿大面临的挑战表明，政策制定者有必要改革移民项目和政策，以确保移民的外国文凭和以前的工作经验得到公正的评估和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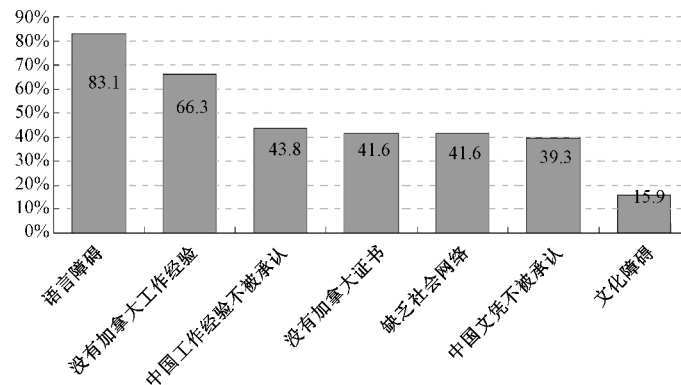


图4 实现主要目标的障碍

（三）移民融合面临的多重障碍

本文的核心目标是调查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华人新移民的经济融合情况，包括他们在融入加拿大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困难。首先有必要探讨“融合”这一术语的含义。至今学界关于融合没有一致的定义，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一术语不言自明，无需进一步解释。实际上，融合是一个变化的术语，意指“变化情境中的各种人和事物”。^[36]有时这一术语可与调整、适应和涵化这些词语替换使用。它经常被看作是一种过程和结果，一种个人和群体现象，一种态度和行为变化。^[37]有时，它被描述为一种“同化”的替代语，一个更具负面含义的术语，通常用来阐释移民放弃他们以前的文化，适应当地新社会的单向过程。如默多德（Modood）所述，同化很少要求东道国做出改变，认为顺应新环境是移民的责任。^[38]尽管在加拿大人们普遍认为融合是“双行道”，要求新移民和东道国都要适应和调整，^[39]但批评者认为“融合”在评估移民的过程中仍然强调顺应模式，支持完全统一的文化构架，抽象地宣扬宽容，但对视为主流之外的文化特殊性仍然持狭隘的态度。^[40]

本文主要聚焦于经济层面的融合，因此，要了解受访者在加拿大的工作经历和对加拿大生活的满意度。当他们被问到在融合过程中是否遭遇重大障碍时，大多数（70%）人表示他们曾经遇到过。其中，语言（84%）和就业（50.9%）是最严重的障碍，其次是社会网络（43.4%）和文化适应（41.1%）。这两个城市的比较研究显示，更多的爱德蒙顿华人新移民（56.8%）在就业方面遇到困难，卡尔加里华人新移民比例为45%。这些发现对这两个城市并非罕事，以前的研究也显示，温哥华的华人新移民曾遭遇同样的障碍。^[41]

至于他们就业的质量和适应程度，受访者把他们在加拿大和中国的经历进行比较认为，华人新移民在加拿大的就业状况在恶化。只有28.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加拿大的就业状况“比较好”或“很好”。有鉴于此，进行比较以突出他们移民前后的就业状况变化就很重要（参见表1）。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移民加拿大之后就业状况恶化，向下层社会流动。在移民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之前，大多数（76.7%）从事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教师、管理、金融和商业领域的工作，但移民

之后，在这些领域工作的人数已下降到 41.9%。另一方面，在加工业和制造业中工作的人数增加到了 17.8%。更糟糕的是，移民后有 11.3% 的受访者失业。在受访者中，最有趣的变化是宣称他们是学生的人数，在加拿大有 11.3%，在中国时只有 3.8%。不太清楚这些人是在到达加拿大之前就已经申请上学，还是由于在加拿大找不到工作而被迫重返校园读书。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移民比土生加拿大公民的就业率更低（67%），失业率更高。^[42]

总体来看，上述就业统计数据显示，华人新移民专业人士在加拿大劳动力市场上遭遇“玻璃天花板”和“玻璃房门”障碍。^[43]他们在高等教育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没有使他们在职场上取得更高的成就，因为他们的外国文凭在加拿大遭遇贬值，很难进入高薪公司从事专业工作。结果华人新移民经历了向下层社会和下层职业的流动，阻碍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本文支持以前的研究发现，与劳埃德·王和卡罗尔·王在 2006 年提出的观点一致，认为高等教育背景本身并不能把华人新移民打造成“模范少数族裔”。

“玻璃天花板”和“玻璃房门”效应也反映出移民的经济收入差距。在本文中，恶化的就业状况直接影响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37.2%）表示，他们的家庭年收入不到 2 万加元（参见图 5），低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这一贫困比例比加拿大总人口中 16% 的低收入比例明显更高，也比加拿大华人总人口中 26% 的低收入比例明显更高。^[44]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过去 25 年来，新移民和土生加拿大公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显著增大。1980 年，从事同样职业的新移民男性的工资收入是土生加拿大男性公民收入的 85%。到 2005 年，这一数字已下降到 63%。^[4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是过去 33 年来在加拿大全国和阿尔伯塔省的失业率处于最低时得出的。^[46]我们不禁要问，阿尔伯塔的经济繁荣让哪些人受益？撰写此文时的加拿大正处于经济萧条，整个国家的失业率为 8%，阿尔伯塔省的失业率为 6.2%，经济形势比 5 年前更加困难，^[47]此时华人新移民的收入差距又是怎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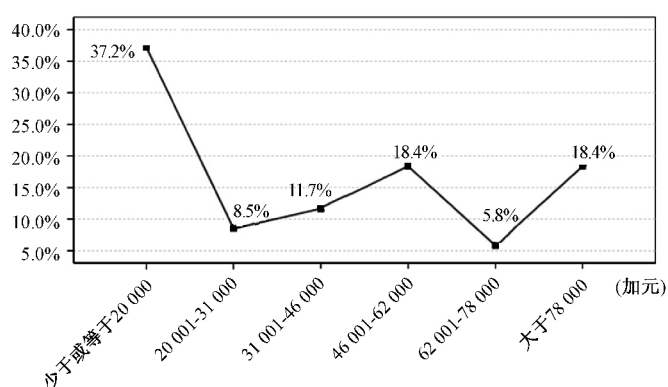


图 5 家庭年收入

鉴于以上移民就业情况的艰难，受访者最需要帮助的两个领域是帮助他们找工作（54.1%）和帮助他们配偶找工作（15.3%），这一发现并不让人奇怪（参见表 2）。其他需要帮助的领域包括入读非母语英语（ESL）课程（13.3%）、申请贷款购买住房（9.1%）和申请贷款创业（7.1%）。图表交叉使用旨在确定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是否对他们寻求帮助的模式有影响。结果

显示，他们在加拿大居住时间越长，所需要的帮助就越少。具体来看，那些在加拿大居住超过 10 年的受访者几乎不需要任何帮助。相反，那些在加拿大居住不到 10 年的受访者表示仍然需要帮助，尤其是找工作。最需要帮助的群体是在加拿大居住不到 3 年的新移民，他们在多个领域需要帮助，例如找工作、参加语言班和申请贷款创业等。这些发现表明，技术移民可能需要长达 10 年的时间才能融入当地社会。这一发现对制定符合接受定居和融合项目与服务的新移民资助政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启示。

当问及他们需要帮助时从何处获得帮助，受访者指出有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他们的雇主、朋友或家庭。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通常向朋友和家庭寻求帮助（66.4%），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7.5%）表示非政府组织是他们的第二选择，再次是政府组织（21.7%）。

表 2 移民需要帮助的领域

找工作	54.1%
为配偶找工作	15.3%
入读 ESL 课程	13.3%
申请贷款买房	9.1%
申请贷款创办企业	7.1%

考虑到加拿大政府已经投入巨资为新移民提供定居和融合的项目与服务，似乎有必要评估现在正在实施的项目和服务的效率，并采取更多改进措施以更加有效地帮助新移民融入加拿大社会。

（四）解读移民向下层社会流动

本研究通过对移民前后职业变化的比较，再次佐证了大量关于移民向下层社会流动的研究发现。^[48] 这些研究证明，新移民的外国文凭和以前工作经验的贬值导致他们向下层社会流动，使移民无法从事移民前的专业工作。更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移民的外国文凭都受到贬值。根据李胜生教授的研究发现，来自英国、西欧和北欧等主流移民国家的外国文凭给他们带来净收益增加，只有黑人和华人新移民等少数族裔移民的外国文凭才遭遇净收益减少的情况。^[49]

有鉴于此，对本研究的数据进行卡方分析，来进一步说明获取大学学位的国别和移民向下层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参见表 3）。分析发现，移民获取大学学位的国别与他们在加拿大的现时就业状况、家庭年收入和实现最初的移民目标的关系是重要的和肯定的。在评估他们的就业状况时，拥有加拿大大学学位的华人新移民中有 58% 表示他们在加拿大的就业状况“比较好”或“很好”，而在拥有中国大学学位的华人新移民中只有 20.9% 认为如此。大多数拥有中国大学学位的受访者（54.1%）认为，他们在加拿大的就业状况比在中国“更差”或“差很多”。就业状况对家庭收入有重要影响。在那些拥有加拿大大学学位的新移民中，几乎有一半人（44.7%）的家庭年收入为 4.6 万~7.8 万加元，有三分之一（34.2%）的人家庭年收入超过 7.8 万加元。相比之下，只有 19.2% 和 14% 的中国大学学位拥有者称有这样的家庭年收入。在收入范围的下线，几乎有一半的中国大学学位拥有者（45.9%）称他们的家庭年收入不到 2 万加元，而拥有加拿大大学学位的新移民中只有 5.3% 表示如此（参见图 6）。由此可以证明，获取大学学位的国别最终决定新移民能否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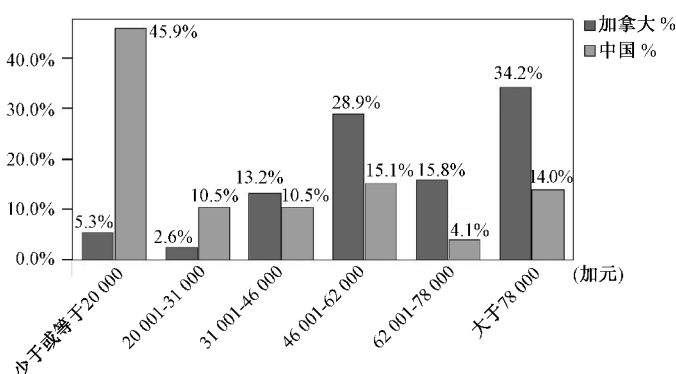


图 6 教育起源与家庭年收入关系

他们当初移民加拿大的目标。绝大多数加拿大大学学位拥有者（82.9%）声称他们已经实现当初移民的主要目标，相比之下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大学学位拥有者表示如此。

表3 拥有加拿大大学学位（n=41）和中国大学学位（n=199）的
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融合与向下层社会流动变量表

社会经济因素	加拿大大学学位拥有者		中国大学学位拥有者		df	χ^2	phi/ crv
	人数	%	人数	%			
现时就业情况					3	20.74***	.33 ¹
很好	8	21.1	11	6.4			
比较好	14	36.8	25	14.5			
同样	9	23.7	43	25.0			
比较差	7	18.4	49	28.5			
很差	0	0.00	44	25.6			
现时家庭年收入					3	29.54***	.38 ²
低于 20000 加元	2	5.3	79	45.9			
20001 ~ 46000 加元	6	15.8	36	20.0			
46001 ~ 78000 加元	17	44.7	33	19.2			
高于 78000 加元	13	34.2	24	14.0			
在加拿大的整体情况					2	9.20*	.21 ³
很好	8	20.0	8	4.2			
比较好	21	52.5	72	37.5			
同样	8	20.0	47	24.5			
比较差	2	5.0	51	26.6			
很差	1	2.5	11	5.7			
个人目标实现情况					2	35.74***	.39 ⁴
已经实现	34	82.9	65	33.3			
不知道或难说	5	12.2	42	21.5			
没有实现	2	4.9	88	45.1			
遭遇的主要障碍					1	14.76***	.25 ⁵
遇到	19	46.3	148	76.3			
没有	22	53.7	46	23.7			
需要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帮助					1	60.26***	.51 ⁶
需要	5	12.8	149	77.2			
不需要	34	87.2	44	22.8			

注：crv = Cramer's V, * $p < 0.05$, *** $p < 0.001$.

四、讨论与结论

本文通过对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华人新移民融合经历的考察，探讨移民在加拿大向下层社会流动的问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加拿大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加大了吸纳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力度，以帮助缓解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然而，正如本研究显示，许多华人新移民在努力融入加拿大社会的过程中遭遇多重障碍，尤其在就业和语言方面。本文的受访者移民加拿大之后，他们以前的学历和工作经验遭遇贬值，导致他们失业和低就业，经济表现不佳，以致向下层社会流动，最终阻碍了他们的整个融合进程。尽管全球化已经打开技术工人的世界市场，促进人力资源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但不幸的是，由于当地劳动力市场根据移民的性别、种族和外国身份区别对待他们，这种转移的潜在价值不能完全得到实现。^[50] 华人新移民的种族化经历证明，移民的概念是一种以肤色为基础和标志

的社会建构。^[51]

“玻璃天花板”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卡尔加里和爱德蒙顿华人新移民的融合经历。尽管许多人移民加拿大时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但他们在加拿大劳动力市场遭遇严重障碍。由于“玻璃天花板”概念主要用来阐述移民在升职时所遇到的障碍，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来全面解释移民的融合经历。针对华人新移民，首要议题是升职之前首先要进入公司工作，但令人惋惜的是，制度化障碍使移民专业人士无法进入那些能充分发挥他们知识和技能的工作领域。

专业协会和学历认证机构有可能会被指责是贬低移民的外国文凭和以前工作经验的参与者和组织者，经常在限制移民进入高薪专业领域工作时充当“把门人”。通过设定一些权力手段，诸如看不见的监督、检查、激励和规范化，专业协会和学历认证机构创建了一套贬低和低估移民以前学历和工作经验的管理系统。^[52]这些权力手段在实践中把知识和技能划分为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等类别，结果移民专业人士总是徘徊于可接受与不可接受之间。与其说移民专业人士遭遇了“玻璃天花板”，不如说他们遭遇“玻璃大门”，而阻碍他们进入被保护的专业行业，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被认为是存在差异和缺陷的，因此必须要贬值。

实际上，移民专业人士在融入加拿大社会的过程中遭遇了“三重玻璃效应”。第一重是“玻璃大门”，决定移民是否能够成为他们专业行业的会员并进入专业工作领域。然而，成功通过学历认证并不能保证他们获得专业领域的工作，移民专业人士需要专业公司聘用他们。在寻找专业领域的工作岗位过程中，许多移民遭遇第二重玻璃效应，即“玻璃房门”。如克利须那·潘德科和拉维·潘科德指出，玻璃房门设置了限制弱势工人进入高薪公司工作的障碍。在这一层次雇主是主要参与者。雇主可借口新移民没有加拿大工作经验、或者他们以前的工作经验无法与加拿大的工作经验相媲美，而拒绝向移民提供高薪专业工作岗位。更有新移民因为他们的肤色或英语口语口音而找不到高薪专业工作岗位。对于那些已经拥有高薪专业工作的幸运者，他们可能会遭遇第三重玻璃效应，即“玻璃天花板”。如前所述，“玻璃天花板”阻碍他们向管理层职位流动。更糟糕的是，一些移民可能与白人同事从事同样的工作，但工资要比他们低，从而产生收入上的种族化差异，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分裂状况。

显然，在描述移民的经济融合过程中，“玻璃大门”、“玻璃房门”和“玻璃天花板”这三个概念不能互相替换。相反，他们准确地反映了移民在定居和融合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所遇到的各种制度性障碍。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三种现象可能会汇聚产生“三重玻璃效应”，这种综合效应可能导致新移民的失业和低就业，经济表现不佳，以及向下层社会流动。

本文的研究发现填补了一项关于加拿大大草原省份二线移民接纳城市新移民研究的重要空白。本文对改革外国文凭认证项目以及帮助移民专业人士定居和融入加拿大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鉴于移民向下层社会流动的原因十分复杂，“三重玻璃效应”又发生在移民融合过程中的多个节点，因此，任何一项解决方案都不能一蹴而就。相反，问题的解决需要一项高度一致的政策，需要包括政府组织、专业协会、雇主、教育机构和学历认证机构等多个行为体的共同参与。更重要的是，加拿大政府应采纳融合框架政策，除承认移民的流动自由外，还要保证他们能享有与其他加拿大人一样同等的公民权益。^[53]更不应该把移民看作是有缺陷或低人一等的个体，而应该通过认证公平承认和肯定他们对加拿大社会所做的积极贡献。另外，认证公平也应给予移民多元而非单一公民身份，承认他们的跨国流动并肯定他们所拥有的独特传统、价值观、语言和知识。

[注释]

- [1] Statistics Canada, *Immigration in Canada: A Portrait of the Foreign-Born Population, 2006 Census*,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2007.

- [2] Derek Cook and Valerie Pruegger, “Attraction and Retention of Immigrant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City of Calgary”, *PCERII Working Paper #WP02 – 03*, Edmonton: PCERII, 2000; Harvey Krahn, Tracey Derwing and Baha Abu-Laban, “The Retention of Newcomers in Second- and Third-Tier Cities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9, No. 4, 2005, pp. 872 – 894.
- [3] Jim Frideres, “Cities and Immigrant Integration: The Future of Second- and Third-Tier Centres”, *Our Diverse Cities*, No. 2, 2006, pp. 3 – 8.
- [4] Bill Jordan and Franck Düvell, *Migration: The Boundaries of Equality and Justice*, Cambridge: Polity, 2003.
- [5] Bill Jordan and Franck Düvell, *Migration: The Boundaries of Equality and Justice*, Cambridge: Polity, 2003, p. 63.
- [6] 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9.
- [7] Anthony McGrew, “Globalization in Hard Times: Contention in the Academy and Beyond”; Roland Robertson and Kathleen E. White, “What is Globalization?” G. Ritzer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Globalization*, ed. G. Ritzer,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p. 29 – 53, 54 – 66.
- [8] IBid, pp. 1 – 13.
- [9] [12] Peter Jarvis, *Globalisation, Lifelong Learning and the Learning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
- [10] Arjun Appadurai,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 in J. Vincent (ed.),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s: A Reader in Ethnography, Theory and Critique*,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pp. 271 – 284.
- [11] Anthony R. Welch, “Globalisation, Post-modernity and the State: Comparative Education Facing the Third Millennium”,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 37, No. 4, 2001, pp. 475 – 492.
- [13] George Ritzer,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Globalization*; Roland Robertson and Kathleen E. White, “What is Globalization?”
- [14] [15] 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9.
- [16] Statistics Canada, *Canada’s Changing Labour Force, 2006 Census*,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2008.
- [17] Krishna Pendakur and Ravi Pendakur, “Minority Earnings Disparity Across the Distribution”, *Canadian Public Policy*, Vol. 33, No. 1, 2007, pp. 41 – 60; Krishna Pendakur and Simon Woodcock, “Glass Ceilings and Glass Doors? Wage Disparity within and between Firm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Vol. 28, No. 1, 2010, pp. 181 – 189; Lloyd L. Wong and Carol Wong, “Chinese Engineers in Canada: A ‘Model Minority’?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Glass Ceiling”, *Journal of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Vol. 12, No. 4, 2006, pp. 253 – 273.
- [18] Lloyd L. Wong and Carol Wong, “Chinese Engineers in Canada: A ‘Model Minority’?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Glass Ceiling”, *Journal of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Vol. 12, No. 4, 2006, pp. 253 – 273.
- [19] [20] [23] Bernard Wong, *The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Globaliza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Ethnic Identit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p. 23.
- [21] Sara De la Rica, Juan J. Dolado and Vanesa Llorens, *Ceiling and Floors: Gender Wage Gaps by Education in Spain*, Discussion Paper No. 1483, Bonn: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2005; Liza McCoy and Criti Masuch, “Beyond ‘Entry-Level’ Jobs: Immigrant Women and Non-Regulated Professional Occup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Vol. 8, No. 2, 2007, pp. 185 – 206; Krishna Pendakur and Simon Woodcock, “Glass Ceilings and Glass Doors? Wage Disparity within and between Firm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Vol. 28, No. 1, 2010, pp. 181 – 189; Krishna Pendakur and Ravi Pendakur, “Minority Earnings Disparity Across the Distribution”, *Canadian Public Policy*, Vol. 33, No. 1, 2007, pp. 41 – 60; Bernard Wong, *The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Globaliza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Ethnic Identity*, Lanham, MD:

- Rowman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Lloyd L. Wong and Carol Wong, “Chinese Engineers in Canada: A ‘Model Minority’?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Glass Ceiling” , *Journal of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Vol. 12 ,No. 4 , 2006 , pp. 253 – 273.
- [22] Lloyd L. Wong and Carol Wong, “Chinese Engineers in Canada: A ‘Model Minority’?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Glass Ceiling” , *Journal of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Vol. 12 ,No. 4 , 2006 , pp. 253 – 273; Bernard Wong , *The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Globalization , Social Networks and Ethnic Identity* , Lanham ,MD: Rowman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 [24] Krishna Pendakur and Ravi Pendakur, “Minority Earnings Disparity Across the Distribution” , *Canadian Public Policy* , Vol. 33 ,No. 1 , 2007 , pp. 41 – 60.
- [25] Sara De la Rica , Juan J. Dolado and VanesaLlorens , *Ceiling and Floors: Gender Wage Gaps by Education in Spain* , Discussion Paper No. 1483 , Bonn: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 2005; Liza McCoy and Criti Masuch, “Beyond ‘Entry-Level’ Jobs: Immigrant Women and Non-Regulated Professional Occupations”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 Vol. 8 ,No. 2 , 2007 , pp. 185 – 206; Krishna Pendakur and Simon Woodcock, “Glass Ceilings and Glass Doors? Wage Disparity within and between Firms” ,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 Vol. 28 ,No. 1 , 2010 , pp. 181 – 189.
- [26] Liza McCoy and Criti Masuch, “Beyond ‘Entry-Level’ Jobs: Immigrant Women and Non-Regulated Professional Occupations”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 2007 , Vol. 8 ,No. 2 , pp. 185 – 206.
- [27] Krishna Pendakur and Simon Woodcock, “Glass Ceilings and Glass Doors? Wage Disparity within and between Firms” ,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 Vol. 28 ,No. 1 , 2010 , pp. 181 – 189.
- [28] Statistics Canada , *Canada’s Ethnocultural Mosaic , 2006 Census* ,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 2008.
- [29] Shibao Guo and Don DeVoretz, “The Changing Face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 Vol. 7 ,No. 3 , 2006 , pp. 275 – 300.
- [30] Peter S. Li , *Destination Canada: Immigration Debates and Issues* , Don 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3.
- [31] Statistics Canada , *Educational Portrait of Canada , 2006 Census* ,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 2008.
- [32] Lloyd L. Wong and Carol Wong, “Chinese Engineers in Canada: A ‘Model Minority’?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Glass Ceiling” , *Journal of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Vol. 12 ,No. 4 , 2006 , pp. 253 – 273.
- [33] Statistics Canada , *Longitudinal Survey of Immigrants to Canada: A Portrait of Early Settlement Experiences* ,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 2005.
- [34] Peter S. Li , *The Chinese in Canada* , Don 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8; Jin Tan and Patricia E. Roy , *The Chinese in Canada* , Ottawa: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 1985.
- [35] Statistics Canada , *Longitudinal Survey of Immigrants to Canada: Process , Progress and Prospects* ,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 2003; Statistics Canada , *Longitudinal Survey of Immigrants to Canada: A Portrait of Early Settlement Experiences* ,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 2005.
- [36] Jack Jedwab, “Canadian Integration: The Elusive Quest for Models and Measures” , *Canadian Diversity* , Vol. 5 , No. 1 , 2006 , pp. 97 – 103.
- [37] Usha George, “Immigrant Integration: Simple Questions , Complex Answers” , *Canadian Diversity* , Vol. 5 ,No. 1 , 2006 , pp. 3 – 6.
- [38] Tariq Modood, “Multiculturalism , Ethnicity and Integration: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 *Canadian Diversity* , Vol. 5. No. 1 , 2006 , pp. 120 – 122.
- [39] Lara Winnemore and John Biles, “Canada’s Two-way Street Integration Model: Not Without its Stains , Strains and Growing Pains” , *Canadian Diversity* , Vol. 5 ,No. 1 , 2006 , pp. 23 – 30.
- [40] Peter S. Li, “Deconstructing Canada’s Discourses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 Vol. 4 ,No. 3 , 2003 , pp. 315 – 333.
- [41] Shibao Guo and Don DeVoretz, “Chinese Immigrants in Vancouver: Quo Vad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 Vol. 7 ,No. 4 , 2006 , pp. 425 – 447.

- [42] Statistics Canada , *Canada's Changing Labour Force , 2006 Census* ,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 2008.
- [43] Krishna Pendakur and Simon Woodcock , “Glass Ceilings and Glass Doors? Wage Disparity within and between Firms” ,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 Vol. 28 , No. 1 , 2010 , pp. 181 – 189; Lloyd L. Wong and Carol Wong , “Chinese Engineers in Canada: A ‘Model Minority’?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Glass Ceiling” , *Journal of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Vol. 12 , No. 4 , 2006 , pp. 253 – 273.
- [44] Colin Lindsay , *Profiles of Ethnic Communities in Canada: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nada* ,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 2007.
- [45] Statistics Canada , *Earnings and Incomes of Canadians over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 2006 Census* ,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 2008.
- [46] Statistics Canada , *Labour Force Survey* , 2008 , <http://www.statcan.gc.ca/daily-quotidien/080208/dq080208a-eng.htm>.
- [47] Statistics Canada , *Latest Release from the Labour Force Survey* , 2010 , <http://www.statcan.gc.ca/subjects-sujets/labour-travail/lfs-epa/lfs-epa-eng.pdf>.
- [48] Gurcharn Basran and Li Zong , “Devaluation of Foreign Credentials as Perceived by Visible Minority Professional Immigrants” ,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 Vol. 30 , No. 3 , 1998 , pp. 6 – 18; Shibao Guo , “Difference , Deficiency , and Devaluation: Tracing the Roots of Non/recognition of Foreign Credentials for Immigrant Professionals in Canada” , *Canadia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Adult Education* , Vol. 22 , No. 1 , 2009 , pp. 37 – 52; Harvey Krahn , Tracey Derwing , Marlene Mulder and Lori Wilkinson , “Educated and Underemployed: Refugee Integration into the Canadian Labour Market”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 Vol. 1 , No. 1 , 2000 , pp. 59 – 84; Peter S. Li , “The Role of Foreign Credentials and Ethnic Ties in Immigrants’ Economic Performance” ,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 33 , No. 2 , 2008 , pp. 291 – 310; Peter S. Li , “Immigration from China to Canad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ssues of Brain Gain and Brain Loss” , *Pacific Affairs* , Vol. 81 , No. 2 , 2008 , p. 220.
- [49] Peter S. Li , “The Role of Foreign Credentials and Ethnic Ties in Immigrants’ Economic Performance” ,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 33 , No. 2 , 2008 , pp. 291 – 310.
- [50] Peter S. Li , “Immigration from China to Canad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ssues of Brain Gain and Brain Loss” , *Pacific Affairs* , Vol. 81 , No. 2 , 2008 , p. 220.
- [51] Peter S. Li , “Deconstructing Canada’s Discourses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 Vol. 4 , No. 3 , 2003 , pp. 315 – 333.
- [52] Per Andersson and Shibao Guo , “Governing through Non/recognition: The Missing ‘R’ in the PLAR for Immigrant professionals in Canada and Swede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 Vol. 28 , No. 4 , 2009 , pp. 423 – 437.
- [53] Shibao Guo , “Toward Recognitive Justice: Emerging Trends and Challenges i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 Vol. 29 , Nov. 2 , 2010 , pp. 149 – 167.